



广州市宣传文化
出版资金资助出版



龚育之◎著

龚育之 党史论集

上卷

 湖南人民出版社

独特的超越

◎ 龚育之对党的理论和历史的几个贡献（代序）

石仲泉

龚育之在2004年撰文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时，曾以《独特的超越》为题比较研究了邓小平时代的中国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2008年初，北京社科名家文库出版的龚育之自选集，以《独特的超越》作为书名。这里，我想借此作为拙文之名，谈谈他对党的理论和历史的几个贡献，姑且称之为“一、二、三、四、五”。

一、关于一面“旗帜”

高举旗帜，这是常用的政治语汇。但旗帜是什么，以什么权威的说法来支撑，并为公众所认同，这是不少理论工作者在琢磨的问题。1990年10月，第五次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学术讨论会在安徽马鞍山市召开，我和中央文献研究室几个同志与老龚一起赴会。他在听了两天会后，19日作《再谈毛泽东思想研究的新起点》发言，开门见山地引用青年毛泽东的话：“主义譬如一面旗帜，旗帜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与会者顿感思想豁然开朗。他介绍那时的毛泽东说，参加新民学会的青年学子都在探讨如何改变中国的苦难命运。毛泽东在致罗章龙的信中提到：我们除了刻苦励志之外，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我们学会要将感情的结合变为主义的结合。龚育之发挥道：旗帜树起来，就可以在这面旗帜下集合人，引导人们向着既定的目标和方向前进。当年，中国革命先驱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队伍的旗帜。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科学结果，被称为毛泽东思想，从党的七大开始，

也写到我们队伍的旗帜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引导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今天我们还需要不需要旗帜？当然需要。坚持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仍然是我们树起的旗帜”^①。大家都赞同龚的说法。此后不久，毛泽东的“主义譬如一面旗帜”，成为宣传媒体广泛引用的名句。1993年11月，江泽民在号召全党学习《邓小平文选》第3卷报告会的讲话中引用毛泽东的这句话后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郑重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经过延安整风和党的七大，又郑重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写到自己的旗帜上。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经过十二大、十三大到十四大，我们又郑重地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写到了自己的旗帜上。”^②十五大进一步论述旗帜问题的至关重要性，指出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明确大会的主题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十七大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了新的概括之后，提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的战略任务。

旗帜问题在近20年来产生这么巨大影响，与老龚首先阐释毛泽东的“主义譬如一面旗帜”思想不无关系。老龚为什么能提出这个问题呢？他既十分熟悉毛泽东的文献，又具高度的政治敏锐性，且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时主持编辑的《毛泽东早期文稿》，正好在1990年7月出版。这使他在马鞍山会议上的讲话有了可供查阅的文献依据。那个时候有一种“返祖”现象，有点与“五四”时期相似，主张淡化“主义”、多解决些实际问题的思潮在一部分人中颇有市场。龚育之明确表示，不能赞同。“马克思主义者要‘力戒空谈’，‘少说空话’。但是，淡化‘主义’，不谈‘主义’，这不行。没有‘主义’，就没有共同的理想、共同的指导思想、共同的前进方向；研究和解决我们面前的现实问题，也就会失去怎样为‘该’怎样为‘不该’的共同的真理观和价值观。因此，今天我们仍然需要树起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③。

顺便说一句，在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前期，对老龚有一种看法，说他在政治上不强。我始终不明白，他不强在哪里？他为党默默无闻地做了那么多工作，写了那么多有很大影响的理论宣传文章，包括上面所引的讲话，政治立场十分鲜明。这难道在政治上还不强？后来，我悟出来了，所谓不强，乃不“左”也。但是，我们党所需要的正是这种政治立场鲜明而又不“左”的理论家和党史学家。

① 《龚育之文存》上卷，第424页。

② 《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第445页。

③ 《龚育之文存》上卷，第425页。

二、关于指导思想的“两个发展趋向”

这是老龚在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写的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的十年”两章中提出的创见。随后他在主持编纂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卷稿”时作了进一步阐发，认为要将按照历史原貌写历史和站在时代高度看历史统一起来，“两个发展趋向”有助于说明建国后29年曲曲折折的发展历史。他说：这个思想“提供了贯串起来观察和分析建国以来党的全部历史的一个重要的思路和方法。往前延伸，建国初的七年中也存在这两种发展趋向，并且分别同其后十年中的两种发展趋向相接续，不过前七年中错误的发展趋向不像其后十年中那么占据重要地位罢了。往后延伸，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错误的趋向暂时压倒了正确的趋向，而正确的东西仍然不绝如缕；从更加长远的历史来看，正确的趋向终归克服了错误的趋向，从而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开创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十多年的历史新时期”。这是这段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要如实地写出‘两个发展趋向’相互间起伏交错的复杂情况。这种复杂交错，在各个时期性质和情况不尽相同，但有复杂交错，不是简单的黑白分明，则是共同的”^①。

为了说明毛泽东的思想认识在这个时期的频繁变化，老龚还提出指导思想内部存在两个侧面的观点。他说：“文化大革命”前十年有几次大反复。怎样分析这十年的大反复？就要揭示指导思想内部矛盾的两个侧面，一个时候这个侧面占主导地位，过一个时候另一个侧面占主导地位；对形势估计的巨大变化，影响着指导思想两个侧面的主导地位的转变，从而历史的进程发生大转弯、大反复。“这是对‘两个发展趋向’思路的一个深化”^②。

当然，对“两个发展趋向”的概括不是偶然的。第二个《历史决议》一方面肯定了这十年党的探索积累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和形成的许多理论观点、政策思想；另一方面又分析这十年中的错误如何进一步发展，直至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情况。这实际上孕育了“两个发展趋向”思想。胡乔木在《中国为什么犯二十年“左”倾错误》一文中还指出：1957年以后，中国的革命任务已经完成，社会主义的主题需要由革命斗争转向和平建设。这时，党内的一种趋势是适应历史的变化，继续从实际出发，力求中国经济在新的制度下稳定发展，同时继续完善新的制度。这是党内和国内大多数人的愿望。另一种趋势却不能适应历史的变化，坚持要

^① 《龚育之论中共党史》上卷，第431页，第437~438页。

^② 《龚育之论中共党史》上卷，第438页。

求沿着过去长期的革命轨道前进。胡绳在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时，强调对建国后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史要作具体分析，认真总结历史经验，特别是对“文化大革命”前十年的历史要作细致的分析。在这十年中正确和错误交织，取得成绩中间有许多曲折的经历，党的指导思想经常有变化。显然，“两个发展趋向”论是对胡乔木和胡绳的思想的凝练和提升。

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卷稿展开阐发“两个发展趋向”论后，赞同者有之，不赞同者也有之。作为学术观点，见仁见智是很自然的，不必苛求。有的议论曰：一是这没法与两条路线斗争论区别开来；二是会损害毛泽东的形象。对此，不能不再作说明。显然，这有不小误解。提出“两个发展趋向”论，正是为了破除两条路线斗争论来说明党的曲折发展历史的。因为路线斗争论是以人划线，正确者一切皆正确，错误者全盘皆错，将复杂的历史事件和人物都简单化、脸谱化了，这是造成一些历史错案的重要原因。“两个发展趋向”论的核心是对具体问题逐一进行具体分析，努力科学地说明正确与错误交织的情况，将两者剥离开来作出符合历史实际的说明。也正因为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与正确思想十分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为了在否定他的晚年错误的同时对其正确的思想加以实事求是的肯定，故要强调“两个发展趋向”和思想矛盾的两个侧面，以期不要损害毛泽东的形象。所以，只要理智地而不是情绪化地对待“两个发展趋向”论，是绝对得不出上述看法的。正因为如此，胡绳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出版座谈会上对这个观点作说明后指出：这也许提供了能够说明贯穿建国后社会主义时期复杂历史的一种看法。不少学者都认为，在《历史决议》摒弃用路线斗争论讲党的历史发展后，“两个发展趋向”的思路，是目前解释党的曲折发展历程的比较好的方法。它是对党史理论的一个重要创新和对中共党史学的一大贡献。

三、关于 20 世纪的“三个历史伟人”

1993 年 12 月，为纪念毛泽东诞辰 100 周年，老龚同《经济日报》记者发表了《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的谈话，还为中宣部等单位举办的“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研讨会”提交了《邓小平论毛泽东》的学术论文。在这两篇文稿中，都讲了 20 世纪的中华民族有“三个历史伟人”。他说：20 世纪，中华民族在争取解放和振兴的伟大斗争中，产生了三位伟人：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毛泽东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实现了向社会主义过渡，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现在，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我们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正集中力量为

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纪念历史伟人，不仅要缅怀他们的丰功伟绩，更重要的是推进他们的思想和事业。

老龚的这个观点不仅博得党史学界和理论界绝大多数人的认同，而且深受广大群众和干部、包括海外侨胞的欢迎。作为全党集体智慧结晶的十五大报告，肯定这个观点指出：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产生了三位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

十多年来，也有不同声音。一是不赞成这个提法，贬斥三位历史伟人的言论从未断过。这里既有政治歧见方面的，也有学术层面持异议的，暂且不去讨论。二是最近听到一种意见，说三位历史伟人与四代党的领袖的关系怎么摆平？这是将两类问题混淆了。庆祝建国60周年抬出党的四位领袖画像，是属于政治性的。它与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是两个范畴，既有交叉，但不能完全赞同；有的属于对21世纪历史贡献的评价。因此，这丝毫撼动不了20世纪的“三个历史伟人”的学术观点，也影响不了老龚提出这个观点的历史价值。

四、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四个观点

从2004年夏天起，老龚同我一起作为首席专家，主持属于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项目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及其基本经验》研究课题。这个课题的核心专著已结项出版，获得许多专家好评。尽管老龚没有看到课题的最终成果，但它凝聚了老龚的智慧和心血。没有他对课题性质的把握和提纲的敲定，这项任务不可能完成得这么完好。在研讨中，他提出了不少新的观点，特别是下述四个观点，不仅对课题出彩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对推动党的理论和历史研究有重要意义。

一是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首次概括为“民族化和当代化”两个方面，作为完整理念推出。他在2005年1月课题组会议上提出：以前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般从“民族化”方面讲得较多，没有特别强调时代性。现在，时代主题发生很大变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需要与时俱进，要讲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即“要把马克思主义同当前时代的发展、同当前时代的特征结合起来”。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与民族化，就是“要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不同的民族环境中，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老龚强调“当代化”，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的一个重要丰富。十七届四中全会决议讲的“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是对“当代化”思想的延伸。

二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动态性表述，解决了三个“30年”只发生

两次历史性飞跃的难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进程，在总体上是同质的。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分期，采用党史分法，即新民主主义革命 28 年、新中国成立后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 29 年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现在的三个时期，简单地说三个“30 年”。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却只有两次。这使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表述发生不小困难。第一个“30 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 28 年）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是明确的。第三个“30 年”（1978 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次历史性飞跃”也没有疑问。关键在新中国成立后的 29 年即第二个“30 年”如何表述。在讨论中，老龚提出可否表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延伸和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准备（1949—1978）”后，大家茅塞顿开。这个观点见诸报端，赢得许多学者首肯。课题据其展开论述，成为一个重要亮点。当然，在阐释时，还可以像张静如提出的，将 10 年“文化大革命”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暂时性中断”来说圆。但这不影响对这段历史的总定位。

三是“三大拨乱反正”和“三大理论创新”。2006 年 5 月上旬课题组在怀柔雁栖湖讨论稿子时，老龚讲了这个观点。在六月中旬北京首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坛开幕式上，他更加明确指出：有三个东西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理论上的三大创造。一个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一个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一个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三大理论创新之前，还有三大拨乱反正，即从两个凡是到实事求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半封闭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改革和对外开放。这样讲拨乱反正和理论创新，在学界没有过。将邓小平等领导人讲的三大转变并为两个，再加上从两个凡是到实事求是，这没什么疑问。但对三大理论创新突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而没有科学发展观，他在论坛讲过后就有同志问我。据我理解，这主要是因为对科学发展观已在作指导思想的定位宣传，将其视为十六大以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理论的总称谓，因而是高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理论平台，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则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处于同一个层次上。这可能是他作这样概括的一个重要考量。对这样的概括有不同看法，属于学术之见，完全可以讨论。但老龚的这两个观点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研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会产生影响。

四是创新与异端。老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坛”上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异端”问题》，阐述了“异端”与创新的辩证关系。他说：针对着过去被认为是正确而实践证明是不正确的东西，这样才能创造新的东西。而许多创新的东西最初往往被视为“异端”。毛泽东思想就包含许多重大的、甚至被某些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是“异端”的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许多理论，恰恰被认为是有点“左道旁

门”、有点“另类”、有点“异端”里创造出来的。还说：上述三大拨乱反正和三大理论创新，在过去的“左”倾观点或马克思主义传统观点看来都被视为“异端”，其实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性发展的东西。论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重要的是论述那些曾经被视为“异端”的重大的创造性发展上。这个观点不仅对我们的课题研究起了重要指导作用，而且在学界同样反响强烈。

老龚尽管高龄体弱，肾病缠身，但没影响他的理论创新思维。提出上述四个观点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当代化问题》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异端”问题》，是他在生命的最后岁月百折不挠地攀登理论高峰的力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达到了新的境界。

五、关于党史“中卷稿”分为“五编”的构想

老龚在正式就任中央党史研究室常务副主任以前，按照他的话说，作为“客卿”，从1995年初起参与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卷稿的讨论。将新中国成立后的党史从原来设想的写成本“下卷”，改为以十一届三中全会分期写成“中卷”和“下卷”两本，先集中力量写“中卷”，是他向胡绳建议的。是年六月在中央党史研究室任职后，负责主持“中卷稿”编写工作。他提出，“中卷稿”可分为“五编”。第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党的新民主主义纲领在全国的实施”（1949年10月—1952年12月）；第二编“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1953年1月—1956年9月）；第三编“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和探索中的两种发展趋向”（1956年9月—1966年5月）；第四编“‘文化大革命’的内乱和对‘文化大革命’的各种形式的抗争”（1966年5月—1976年10月）；第五编“在徘徊中前进和走向历史的伟大转折”（1976年10月—1978年12月）。1999年3月老龚不再担任领导，根据中央主管领导指示，将胡绳审定过的“中卷稿”，分送党的高层领导和部分专家征求意见后，我们对有的编目文字作了调整，对部分内容作了某些修改，但主体和基调没变。“中卷”名称改成“第二卷”，延续至今。上述分编，涉及历史分期问题。党史界部分专家对此有不同看法，主要是对“一头一尾”的分法有异议。

——先说“头”两编。有的同志不赞成将建国后头七年分为“前三年”和“后四年”，认为这样不符合1981年《历史决议》，也有否定社会主义改造之嫌。其实，这又是误解。老龚在讨论稿子和上报胡绳时都讲了这样分编的考虑。他说：考虑到建国头三年和后四年，在主要任务、指导方针、基本政策等方面，确有不同特点，我们认为，以1953年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为界，把这七年分作两编来写，

能比较客观地描绘出两个时期的历史原貌，也便于今天的读者了解这两个时期实际存在着的区分和衔接。分为两编，当时还有一个考虑，他没讲。即这头七年是建国后发展最好的时期之一，用两编的篇幅来展开叙述，更能展示党的历史发展中辉煌的方面。对“前三年”的编名，不采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说法，而用“党的新民主主义建国纲领”来统领，旨在重新强调那个纲领的新民主主义性质，合乎建国最初几年的历史实际，并同改革开放以来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某种更自然的联系。对突出“前三年”的新民主主义性质，胡乔木有明确说法：“中央并未在中央正式文件中讲过1949年建国就标志着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只是毛泽东同志1953年底在修改中宣部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提纲时加过这样一句话。但在1949—1952年中，中央从来就讲新民主主义，否则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就从来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了，新民主主义秩序能否巩固的问题也就不会发生了。如果不是这样认识问题，就会损害1940年《新民主主义论》发表以来直至1949年《共同纲领》通过并加以实行的党的信誉，使党陷于在根本理论上自相矛盾的地位。”^①

至于说这样分编违背《历史决议》，也是不存在的问题。《历史决议》主要起草人胡乔木的观点，如上所述非常明确。老龚报告胡绳说：“单独立编，我们认为并不违反历史决议。正如前一个历史决议和《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称‘党的成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后比较详细地写党史则分开来写，党的成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各为一编或一章，并不违反决议一样。”^②事实上，《历史决议》虽然把头七年放在一起论述，但在阐发时仍是将“前三年”作为单独一条来讲的。“中卷稿”将其作为单独一编，是《历史决议》思想的具体展开。也可以说，“前三年”独立成编地写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真正体现了《历史决议》和胡乔木的指导思想。

这样分编，是否贬低社会主义改造的意义呢？没有。老龚的指导思想没有，“中卷稿”也不存在这个问题。他一直强调，写社会主义改造，要分为两个层面来把握。一是社会主义改造的方向，一是社会主义改造的具体实施。对于前者，他提出应从回顾近代历史到党的成立，来讲实现社会主义奋斗目标的历史必然性。对于后者，要作具体分析。1953年至1955年夏季前，三大改造工作是稳当的、健康的；此后出现的缺点和偏差比较明显。指出这些缺点和偏差不是贬低社会主义改造的意义，而是为党的八大纠正已认识的缺点和偏差作必要的铺垫。从历史的延续性讲，也有利于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政策相衔接。

当然，对社会主义改造这段历史有一个肯定到何种程度的问题。老龚和我都认

^① 《胡乔木文集》第2卷，第158页。

^② 《龚育之论中共党史》上册，第455页。

为，不应当将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说得太满。从总结历史经验角度言，“充分肯定”社会主义改造，不等于说当时的指导方针和工作部署都百分之百的正确，没有任何失误。当时的失误最重要的有两条：一是求快，二是求纯。这就带来很大的后遗症，即长达20年的“历史遗留问题”。对这个“历史遗留问题”不可低估，不能寥寥数语地轻描淡写。后来党的历史发展曲线与它密切相关。一是历史的几次反复都因处理“遗留”而调整政策所引发；二是许多干部（包括有的领导人）和群众为此一再受到批判和伤害；三是尽管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没受到破坏，但长期不调整的结果，就使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受到束缚，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难以充分发挥。胡绳在介绍田家英对于中国社会主义模式的看法说：“如果可以重新从头搞社会主义，我将用另一种方法来搞。”“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这在家英心上是很明确的。他对毛主席也十分尊重。但是他对当时我们实行的社会主义模式（用现在的话来说）渐渐地产生了怀疑，他认为可以有别的模式。”^①从胡绳讲的情况看，田家英并不否定我们国家所走的社会主义道路，但认为在那样很短时间内实现社会主义改造，不一定是最优选择。“充分肯定”它，与说它是否“最优选择”，这是两回事。有的观点往往将这两者混淆起来。其结果，不能科学地说明党的历史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什么要改革，并且从农村开始，就是因为那个时期的改造搞得太纯了，超越了现实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超越了社会历史条件。说白了，最初的改革与解决社会主义改造“历史遗留问题”密切相关。它是启动改革的一个直接动因。如果对其讲得太满，就无法说清改革的由来，也无法说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产生。

——再说“中卷稿”的末编。将“中卷稿”的下限定在1976年粉碎“四人帮”，还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这在党史学界也有不同意见。把“文化大革命”结束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两年，单独作为一篇来写，这是老龚根据胡绳多次讲话强调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而作的决断。这样把握，也是“中卷稿”的首倡。胡绳在1994年11月全国党史研究室主任会议上指出：可以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划分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的标志，此前和此后为两个时期。如果这样，两年徘徊应该属于前一时期还是后一时期？既然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限，那么它就应当放在前一时期。当然，这两年不是“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了，但结束得不太好、不彻底，因此发生两年徘徊。“我们把这两年写在前一个时期的最后，这一时期的内容不只是‘文化大革命’，而是‘文化大革命’与它的结束”。“我认为这样的分法与《历史决议》的精神是相符的”^②。

^① 《胡绳全书》第3卷下册，第653页。

^② 《胡绳全书》第3卷下册，第591页、590页。

有一种意见认为，如果以十一届三中全会来划分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史，那么是否可以遵义会议来划分民主革命时期的党史呢？胡绳也谈到了这一点，认为不能将两者画等号。我以为，这是将两次会议的异与同没有分清楚。就确立党的正确路线、实现党的历史伟大转折来看，这两次会议的意义是一样的。但两者还有相异的一面。遵义会议只是解决党内的路线斗争问题，没有也不可能对当时中华民族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转变产生直接影响，因为还不是执政党，无力解决这个问题。党的历史进程分期与社会关系的变化和社会发展主要矛盾的变化有密切关系。据此，民主革命时期的历史分期，没有简单地以党的路线正确与否来划分，因而没有以遵义会议来划分。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情况不一样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就是执政党。党的路线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对国家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认定，因而影响国家历史发展的实际进程。“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两年徘徊时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只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始，党才真正明确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认识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由此开始实现邓小平讲的三大转变和逐步明确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决定了这30年来的历史发展进程。因此，要以十一届三中全会来“断代”。我们不能因为遵义会议没有成为民主革命分期的历史根据，来反推十一届三中全会不能成为社会主义时期分期划界的理由。

再则，这样的划分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重要文献和中央领导人的讲话是一致的。邓小平明确指出：“界限的划分是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是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开端。”^①党的十四大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②。江泽民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讲话中还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光辉的标志，它表明中国从此进入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胡锦涛在去年底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30周年的讲话中强调：这次会议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踏上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顺便说一下，早在1996年6月，在中央书记处讨论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工作规划时，胡锦涛就明确表示：社会主义时期党史，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你们的中、下两卷的历史分界，这比较站得住脚。我同意建国后的党史以三中全会为界分成两卷来写，这站得住。现在都是讲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历史的新时期嘛！因此，以十一届三中全会划线将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史分为两卷不应当成为问题。既然如此，“中卷稿”安排第五编写两年徘徊是顺理成章的逻辑。否则，就不是“前30年”和“后30年”的关系，而是另一种说法了。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57页；第2卷，第159页。

② 《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第4页。

在讨论最后一编如何写时，老龚还说过：结尾写到十一届三中全会，还可以使“中卷稿”有一个辉煌的“尾巴”。这29年历史的曲曲折折太多，“尾巴”不翘起来，读者会感到沉重和压抑。有了这个辉煌的“尾巴”，能说明党经过那么多挫折，还是正义战胜了邪恶，正确和比较正确的发展趋向最终克服了错误的发展趋向，又有了新的光明前景；中国共产党还是伟大的、光荣的，党的形象树立起来了。我们都认为，这是一种良苦用心。

有的同志担心：“中卷稿”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末编下限，将来写新时期党史如何开头呢？老龚也说过：把三中全会写进来，这段历史比较完整。将来下卷如何开头，还有时间考虑。写下卷是21世纪的事了。利用这两本书的出版间隔，可以打一个“时间差”。正如上卷以建国作终篇，不妨碍“中卷稿”以开国大典作为开篇一样。所谓“重复”不会有问题，因为剪裁的详略、考虑的视角和写作的切入点都会有所变化的。

“中卷稿”的谋篇布局，展现了老龚的大局意识和宏观视野，不仅为这部稿子以后的修改打下很好基础，而且他的上述意见（无论以后的党史本子是否采纳），会对深入研究建国后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史产生深远影响。

老龚关于党的理论和历史研究的总体建树，对当今党史学界言也可视为某种“独特的超越”。像他那样“文理交融”、“史论贯通”的党史大家太少了。他走后留下的学术空间，很难在短时间内得到弥补。对他最好的纪念和怀念，是学习他的人品和文品，尽管我们没有他那样的才华，但要像他那样去努力研究党的理论和历史，不断创新，不断超越。

目 录

上 卷

1. 批判农业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历史文献——读周恩来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 / 1
2. 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 5
3. 遵守党的决议和保障科学研究的自由 / 42
4. 论实事求是 / 47
5.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读《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 / 53
6. 端正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决定性斗争 / 59
7.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的哲学意义 / 69
8. 学习理论、研究现状和研究历史相结合——从《刘少奇选集》下卷出版谈起 / 74
9.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提出 / 79
10. 《毛泽东著作选读》新编本的特色和意义 / 84
11. 《实践论》三题 / 92
12. 几个历史争论的回顾——读《刘少奇选集》下卷首次发表的三篇手稿 / 102
13. 毛泽东和新中国的起步 / 112
14. 新民主主义·过渡时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 138
15. 思想解放的新起点 / 162
16. 党的理论建设的几个问题 / 168

17. 再谈毛泽东思想研究的新起点 / 173
18. 党史研究与当代改革 / 187
19.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实现 / 190
20. 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 / 240
21. 走自己的道路 / 301
22. 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旗帜下——读邓小平著作笔记 / 309
23. 市场经济问题与思想路线问题——围绕邓小平有关论述的对谈录 / 343
24. 新的革命·新的理论·新的旗帜——十四大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 / 360
25. 线索和阶段——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 385
26. 党性和科学性相结合的党史新著——读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 / 399
27. 刘少奇与新中国经济建设——读《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 / 403
28. 从毛泽东到邓小平 / 409
29. 邓小平论毛泽东 / 422
30.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与党史研究 / 432

下 卷

31. 弦急琴催志亦酬——乔木同志的最后岁月和《回忆毛泽东》的写作 / 449
32. 时代的重托，历史的选择——邓小平成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的由来 / 465
33. 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的由来和意义 / 476
34. 三件事和三点思路——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座谈会上的发言 / 492
35. 犹思挥笔追班马——读《胡绳文集》 / 498
36. 理论探索的一份财富——读《张闻天社会主义论稿》 / 502
37. 理论学习和党史研究——从《纲要》谈起 / 507
38. 党的文献和党史研究——读《万里文选》 / 526
39. 理论队伍的理论武装 / 533
40. “壮心未与年俱老”——读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战争岁月)》 / 536
41. 读《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 / 540

42. 先驱者的信念——读《杨匏安文集》 / 547
43. 刘少奇论毛泽东思想：今天的启示——读刘少奇《论党》 / 551
44. 邓小平南方谈话和中国改革发展新阶段 / 557
45. 两大历史关头的道路选择 / 564
46. 业绩·思想·风范 / 571
47. 十五大精神和党史研究 / 580
48. 周恩来和建国以来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 600
49. 思想解放和新时期二十年 / 608
50. 学习理论和研究党史的结合 / 613
51. 从十五大看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和从十五届三中全会看中国农村改革的历史进程 / 616
52. 不尽长江滚滚来 / 639
53. 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卷稿的编写 / 646
54. “纪念五四”的历史回顾和当代意义 / 697
55. 邓小平理论：新中国五十年历史的科学总结 / 704
56. 理论来自历史 / 713
57. 党史工作的党性原则 / 715
58. 党史著述中的十个关系 / 717
59. 关于党史教科书的审定 / 720
60. 对理论和党史教学的一个浪漫设想 / 723
61. 关于建国以来党史的分期 / 725
62. 再谈建国以来党史的分期 / 727
63. 三次三中全会：中国农村改革的历史进程 / 729
64. 关于学习邓小平理论的文献 / 731
65. 关于学习邓小平理论的要求 / 734
66. 为建党八十周年和历史决议二十周年答《人民日报》记者问 / 736
67. 在党的历史决议的基础上前进 / 739
68. 明确的目标 艰辛的探索 / 754
69. 从邓小平南方谈话到江泽民七一讲话——纪念南方谈话发表十周年 / 758
70. 始于和成于之间 首创和坚持之间——读薄老党史新著 / 771
71. 读《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有感 / 777
72. 读《李君如文集：邓小平理论研究》 / 780

73. 十三年：奋斗历程和基本经验 / 783
74. 十三年与新时期党史的分期 / 792
75. 再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 / 794
76. 党的最高领导层的新老交替 / 797
77. 毛泽东文献编辑的文本选择 / 801
78. 毛泽东与八大党章的两个特点 / 804
79. 在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上的发言 / 816
80. 独特的超越——邓小平时代的中国对毛泽东时代的中国 / 821
8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当代化问题——访龚育之教授 / 830
82. 在刘少奇《论党》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 / 837
83. 读《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所想到的 / 843
84. 漫谈口述历史 / 845
85. 党史研究：萎缩还是繁荣？ / 849
86.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异端”问题 / 861
87. 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观点回顾党的历史 / 866
88. 一个让读者更多了解领袖历史的方式 / 891

编后记 / 895

1. 批判农业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历史文献

——读周恩来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

周恩来一九四八年六月写的提纲《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在收入《周恩来选集》（上卷）以前没有公开发表过，也不曾在党内印发，长期不为人们所知晓。现在读了这个提纲，人们都感到，它不仅是我们党为新中国经济建设制定基本方针的重要历史文献之一，而且在今天，当我们总结建国以来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对社会主义进行再认识的时候，它对我们仍然有重要的启发。

写这个提纲的历史背景是：进行了两年的人民解放战争已经由防御转入进攻，数以百计的小、中城市，包括鞍山、潍县、石家庄、洛阳这样的城市已经解放，全国胜利已经在望。全面地具体地制定党的经济政策，既是管理已解放地区经济的现实需要，又是为迎接全国胜利所必不可少的政治准备。毛泽东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开始了这项工作，一九四九年三月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总结了这项工作，党的其他许多领导人在这项工作中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周恩来写了这个提纲；其后不久，一九四八年八月朱德写了《对于解放区经济建设与发展生产的意见》；九月东北局高干会议上提出了张闻天起草的《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详细提纲，十一月中央对它作了修改并把它发到各地；翌年二月刘少奇作了《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方针与问题》的讲话。这期间中央还组织了关于经济问题的大量实际调查和理论研究。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那个论述得十分深刻而周密的经济纲领，是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形成的。这个过程，从一件事例上生